

中共高校党建史研究中口碑史料运用问题探究

匡颖晨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北京 100089)

摘要: 回忆录、口述史料等是中共高校党建史乃至中共党史研究中常用的口碑史料。它们可以作为历史细节考证的证据, 窥档案文件所未见之处, 研究者在实际运用时应注意从多样化的个体记录中求同存异, 以把握中共高校党建史的一般规律与特点; 它们可以作为叙事性历史作品, 其中既有亲历者个人际遇的“真实”记录, 也有为表达事后所思的“虚构化回忆”, 研究者若能善用, 它们可为观察历史环境与时代风气、体察文本中的弦外之音提供依据; 然而从本质上说, 它们是亲历者记忆的载体, 承载着记忆重构的历史, 研究者在运用时需要注意史料的检验与互证, 正确处理好记忆失真、文过饰非等问题。除此之外, 历史与史料是无法分别而论的两个问题, 因此研究者要重视在史料中发现历史以及在历史思维框架内充分运用史料, 以促进中共高校党建史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 中共高校党建史; 口碑史料; 证据; 叙事; 记忆; 历史

中图分类号: D239; G64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5)02-0012-07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5.02.002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Research of CPC Party Building History in Universities

KUANG Yingchen

(The Youth Movement History Archiv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entral School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China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Memoir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etc. are common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arty building history in universities, and even in the research of Party history. They can serve as evidence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details, revealing aspects not seen in archival documents.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from diverse individual records to grasp the general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PC Party building history in universities. They can also be used as narrative historical works, which include both the “real” records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fictional memories” for expressing post-event thoughts. If used properly, they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observing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and social trends, and discern the subtext in the texts. However, in essence, they are carriers of the memories of those who experienced the events, bearing the history of memory re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24-10-08

基金项目: 中央团校一般项目(66619010106)

作者简介: 匡颖晨(1993-), 男, 湖南常德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tion. When using them, research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erification and cross-referencing of materials, correctly handling issues such as memory distortion and whitewashing. In additi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two inseparable issues. Therefore, research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discovering history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ully util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search deepening of CPC party building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PC Party building history in universitie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evidence; narrative; memory; history

中共高校党建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口碑史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口碑史料是指口头讲述并被记录下来的资料,包括回忆录、口述史料、调查记录、群众传说和文艺作品等。相对于记录历史事件的档案等文献史料而言,口碑史料成形于事后,既有档案所缺乏的细节描写,又能够体现个体与集体在历史演进中的关系。李大钊曾言,史料“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决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1],因此,治史(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史料去考察那段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历史。在此,笔者试图对中共高校党建史研究中口碑史料的运用地位以及运用方法等作一番探讨。

一、作为历史证据的口碑史料

在亲历者重构历史时,出神入化的细节描述往往非常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正是对“求真”这一历史学任务的关切回应。然而实际上,追求细节并非历史研究的唯一任务,口碑史料所呈现的历史细节也并非完全可靠,这就使得将口碑史料作为历史证据时,既要重视口碑史料填补历史细节的价值,同时也不能被所谓的“细节”迷惑而不加分辨地拿来使用。例如,在杨沫的半自传体小说《青春之歌》中,详细描写了一位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当众指责学生领袖为“左”倾冒进者的过程。实际上,在当时,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并不能达到如此高的理论认知水平而总结出那是“左”倾冒进,这明显是作者对那段历史的“事后加料”。虽然这一细节描写为我们了解 20 世纪 30 年代那段历史提供了帮助,但是若将此当成历史细节的补充,却是有悖于

史实的。

当然,这并不是暗指所有的回忆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不可靠,而是想指出由于口碑史料的提供者个人认知或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或给出历史细节的结论可能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

例如,对于开展一二·九运动是学生自发的还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问题,根据口碑史料可知,曾担任民先总队长的李昌在 1939 年表示一二·九运动是学生自发举行的^[2];而在运动前入党的姚依林则坚决认为,一二·九运动全程由党领导,党员彭涛实际上是运动的领导人,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主要领导的黄敬(当时为非党员)其实是游行队伍的指挥,这是因为“在游行中黄敬站在有轨电车的铁梯上讲演,被记者照了下来,这张照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全国和世界上都流传甚广”,被误认为是运动的策划者与组织者^[3];在运动中担任总交际的黄华在回忆中对于谁是一二·九运动发起人的说法是谨慎的,他认为运动开始是自发的,但是运动的深入发展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学生宣传工作做得成功^[4]。当然,这也能说明姚依林回忆的正确性。可见,党员和非党员学生站在各自的视角,对一二·九运动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而对于在此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作用,毛泽东总结道:“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5]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套严肃的官方史书中,这场运动被定义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运

动”^[6]。由此来看,搞清楚究竟是谁领导并策划了一二·九运动,是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高校领导并发动学生运动的要点问题,更是值得历史学家与党史工作者考辨的历史问题。

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口碑史料虽然可能会存在相左的记录,但并非没有历史价值,最起码它们从不同视角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证据,证明了中共地方组织、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一二·九运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及一二·九运动给高校的党建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因此,研究者在运用史料时应该通过多方考据实现对历史细节的客观把握,从而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

上述的例子也说明,单一视角的记录不会成为完备全面的史料。在不同的亲历者口中同一历史事件往往呈现出多面化的样式,因此回忆录等口碑史料呈现千人千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贵的是,通过口碑史料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我们能够得到多角度的历史信息,从而拓宽我们看待历史的视野。恩格斯曾说,世界是一幅整体的画面,但是“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7]。由表及里探查历史是有意义的工作,能从各种历史证据中发现一般性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功夫”。在中共高校党建口碑史料中,既存在亲历者对同一事件不同视角的差异化记录,也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内容。因此,研究者在应用史料时,要注重从这些差异中发现与总结相同的历史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观察到历史上高校党建工作的规律与特点。

二、作为历史叙事的口碑史料

口碑史料往往会完整记录事件的全过程以及亲历者对该事件的看法,既包含对历史的客观记录,也包含亲历者对历史的主观解读与评价,从而带有历史叙事的特点。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是史料解读与意义构建的结合,其本质是一种言辞虚构,在内容上既是发现的,也是

发明的^[8]。对于中共高校党建口碑史料而言,它不仅包括高校党组织建设发展的记录,还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党团员等高校党建中的不同角色如何参与革命建设以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等具体工作的叙事。因此在运用时,研究者不仅要注重把握史料的细节,更要贯通史料全部,从而对相关历史形成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一方面,从史料产生的角度来看,在高校党建史研究中,广大师生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是考察高校党建工作不可或缺的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史料的产生有时并非以提供党史资料为目的。它们往往偏向个人经历,而且带有强烈的叙事性,可以说“不是单独的事实陈述”,而是叙述者“用经过进行选取的史事来构筑某种连续性的描述,以展现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样就使叙述转化成了解释”^[9]。

高校党建的工作对象往往是非党员的高校知识分子,因此当研究者运用口碑史料进行研究时,便不能局限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单一视角,更需要从党外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回忆录、口述史料等史料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在党外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大多包含生动的故事情节,相对于高校的档案与文件而言,往往能够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和高校工作的影响。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领导高校工作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历史,可从党外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打捞出许多重要信息。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旧知识分子步入新社会所表现的抵触情绪恰巧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在高校工作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比如,在冯友兰、金岳霖、季羨林等人的回忆录中就对这一时期他们行为上的格格不入与思想上的困惑进行了描述。若是将这些叙事仅仅作为他们个人生活的记录,那么这些回忆录则将成为彻底的文学作品,但如果将这些叙事融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中,将其当作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原因解释与评价,我们不仅能得到丰富的个案,而且更能理解开展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口碑史料一般包含真实的时间、

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但以“虚构”的方式讲述真实事件是口碑史料形成的常态。“虚构事实”虽不能作为“求真”的直接材料,但对于了解时代风气与历史事件的背景、意义会有所帮助。比如,“虚构”的文艺作品有其产生的现实根源与传播途径,其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门类。

例如,在大革命时期,一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青年群体渴望投身革命的社会氛围,而且也成了影响、引导青年行为的“导师”。1925年,蒋光慈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发表的中篇书信体小说《少年漂泊者》,讲述了佃农出身的汪中在父母双亡之后漂泊四方,经历艰难曲折,饱尝人间冷暖,终于从自发地反抗商会会长、货站老板、开旅店的表叔等剥削者中逐渐认识到压迫自己的是这个被资本家与帝国主义操控的“恶社会”,而后投身革命进入黄埔军校,最终战死沙场的故事。此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任何文艺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将现实作为蓝本。尤其是在故事结尾,汪中在去黄埔军校的路上说:“我几经忧患,余生死之于我,已经不算什么一回事了。倘若我能拿着枪将敌人打死几个,将人类中的蠹贼多铲除几个,倒也了却我平生的愿望。”^[10]这正是作者借汪中之口说出了广大青年的革命宣言。著名的革命家陶铸就是在阅读这本小说之后考入黄埔军校从而投身革命的。由此可见,“这对于当时许多处在迷惘之中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11]。总之,中共高校党建口碑史料并非全部是具体历史事件的直接记录,研究者在使用时要运用自己的分析能力,体察文本中的弦外之音,从而形成新的观点,推动历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无论何种史料,放在历史长河中,它们所记录的不过是一个个的片段而已,同样,无论怎样叙事,研究者都必须注意口碑史料不是高校党建的编年通史,而是阶段性的历史重构。马克·布洛赫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

力。”^[12]因此,历史研究工作,就是将零散的片段用想象组合在一起。对于口碑史料,即使是亲历者对其中历史事件的把握也是有限度的,但他们的叙述却能够为研究者回到历史发生的场域提供线索。通过这些线索,研究者可以对口碑史料进行扩充,从而使史料所表达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回到中共高校党建口碑史料这个话题,其中的回忆录、口述史料不仅有个人历史的叙述,而且往往暗含当时社会环境与政治立场的内容。这些史料虽然不能对特定期内的高校党建工作作一全貌式了解,但也能从中分析出一般性的历史现象。例如,在蔡和森所做的关于中共建党工作的调查报告中,记录了当时反动派将中国共产党称作“不过是陈独秀几个野心家的意志所塑造的,或者为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一个组织的说法^[13]。虽然这是一些污蔑之辞,但是作为社会言论,从中也可以发现高校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担当了怎样独特的作用。再如,五卅运动使上海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组织发展起来,并处于一种异常活跃的状态,因此在一份1925年3—9月学生运动的调查报告中这样记载:“五卅运动,实为我们团体半年来加紧训练同志的收获。如果此次五卅运动可以比拟苏俄之二月,那么我们的十月,当不在远了。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十月罢!”^[14]寥寥数语,从中即可看出五卅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高校党建工作的努力以及高校党团组织革命情绪之高涨,这为我们了解高校党团组织的诞生与活动开展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三、作为记忆载体的口碑史料

记忆不全是历史,但人们却习惯从记忆中追寻历史真相。前文的论述几乎是从口碑史料的优势来谈史料运用问题的,绕开了传统观点中对口碑史料劣势的批判。事实上,亲历者的回忆不仅会因主观或客观因素失真,而且还有可能出现故意歪曲事实的情况,甚至于修正或修饰自己的记忆、隐瞒真相。例如,曾国藩攻陷天京后,为请功曾向清廷报告此役杀死太平军

十余万人。历史学家在长时间内对此深信不疑,直到罗尔纲先生与其他资料对比后才发现,天京失陷时城中人口不过三万,战士不过万人,这才订正了史学界这一长达多年的讹误^[15]。这一事例证明,在运用史料时,研究者需要正视口碑史料的劣势,应配合其他史料加以佐证,以便去伪存真。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录、口述史料进行鉴别已经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例如,关于中共一大代表的出席人数,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亲历者在回忆中持不同的说法。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后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亲历者们“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从而不能如实回忆,甚至总结道:“两个人回忆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16]因此,在研究中若仅依赖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则无法得知真相,只有与档案文献或其他真实史料相印证,才能确定其真实性,从而成为“二重证据”。

口碑史料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亲历者记忆的缺失与模糊这类不可避免的缺陷上,而且也表现在有人为隐瞒或歪曲客观历史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口碑史料在运用中需要接受严格的“检验”。同样,对于中共高校党建史口碑史料的运用也应十分注意此种情况。高校党建亲历者特别是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录中往往根据自己的感受或意图来重构历史,若将他们的回忆录视为“罕见史料”“史海钩沉”而不加分辨地引用,研究者则容易陷入“己观历史”的“一家之言”的套路中。例如,张国焘作为参与建党的高校知识分子,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强调自己在 1924 年被捕后表现得坚强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但是,研究者根据京畿卫戍司令部的档案发现,实际上张国焘被捕后可耻地背叛了革命^[17]。因此在阅读他的回忆录时,自然需要运用其他史料对他所记录的历史进行检验与判断。

尽管张国焘故意歪曲事实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是亲历者所描述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左确是常有的情况。比如,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虽未否定上海大学的革命作用,但他却指出大

革命时期上海大学的共产党教员“几乎都是敷衍塞责”的^[18]。而实际上这与他们传授马克思主义、领导学生运动从而使该校的学生党员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的事实是相矛盾的,如果仅听信郑超麟的一面之词而忽视其他关于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党建工作的历史资料,那么上海大学的党建史岂不被曲解?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必须要严肃对待。

但有时在高校师生的回忆录中,文过饰非也并非出于对他人诋毁或故意歪曲事实的目的,而是由于他们看问题的视野有限,无法看到完整的事件,或是由于亲历者急于表达某种情绪而更改了书写的情感基调。比如,在一些关于大革命失败后学生运动的回忆录中就存在这种错误的质疑情绪:组织在运动中遭到破坏,是因为运动方向不正确。而有些回忆录中则更加重视自己或他人的个人“英勇行动”,把事实上缺乏实际价值且显得过“左”的示威游行当成英勇豪迈的个人历史来进行回顾,并对那些事件给予正面评价并表达怀念之情。由于不同的亲历者有不同的视角,因此从某个亲历者的视角出发,看到的历史往往是多面体中的一面。很显然,当研究者评价这些学生运动时,不能从个人的情感出发,也不应被亲历者狭窄的视角所困,而是需要将这些个人纪录与其他史料对比来客观地看待学生运动的历史影响,从而确定其历史地位。因此,对于中共高校党建口碑史料,必须经过与其他史料的对比之后才能运用于严肃的历史研究,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历史性。

四、余论:历史与史料的双向互动

一方面,历史研究不能没有史料,史料收集整理与历史研究不能摆脱客观的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历史研究是相向而行的关系,这使得这两项工作充满了问题意识与学术导向。对于收集整理高校党建口碑史料而言,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框架,从而为记录在档的历史事实积累材料,以便更好地进行历史研究、拓展历史视野。所以,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不应该存在“先知之明”或提前产生“价值判断”,而应该从史料出发,顺藤摸瓜般地探求历史的脉络与表

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开展。

虽然说口碑史料的运用应与既定历史事实紧密结合,但实际上在任何领域的历史研究中新史料的发现往往意味着能够发现新历史,从而引领历史研究前进的方向。在中共高校党建史乃至中共党史研究中也并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份珍贵档案的公布会为研究开辟新路径、新领域;重要历史事件亲历者回忆录的公开也会为相关历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甚至引发学术热议。但是,开展历史研究不应将期望完全寄托在新史料的发现上,从旧史料中提炼新观点更显历史研究的真功夫,从而丰富历史,推动和发展历史研究。因此,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史料,努力在史料中探索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永远是解释历史事件的重要一环。虽然档案文件产生于历史事件发生之际,可以视作历史的痕迹,但是由于其记载的多为个体的事迹,很难与其他历史事件或人物串联起来组成连续的历史。中共高校党建史的研究中经常会用到口碑史料,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口碑史料,则无法获悉一些难以在档案、报刊等史料中记载的历史,比如,解放战争时期高校地下党组织发展学生党员的独特方式^①,这正是口碑史料独特的价值所在。更何况,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传统历史学依赖档案与文字记录追求“纯粹客观历史”的做法已经受到质疑。当然,在实际的研究中,怀疑传统历史学的思潮也不能说全都正确。但以求真为目的是历史研究亘古不变的追求,中共高校党建史的学科气质也决定了追求客观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口碑史料虽是主观产物,其内容失真

也是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并不妨碍在中共高校党建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历史研究的现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口述史比之传统的实证史学更擅长探索的,不是被记录的档案事实,而是当事人在特定社会框架中看到、认知、感受、体验到的经验事实,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这些事实做出判断并付诸行动。”^[20]总之,对于当事人的认知、感受及体验到的事实虽不能以信史的态度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研究中就可以否定它们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需要站在理性的角度,了解中共高校党建口碑史料的收集整理情况,思考并总结史料运用过程中新视角的问题,这对于中共高校党建史的发展大有裨益。

胡绳曾经说过,史料的收集整理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因为“不掌握大量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但是不能将运用史料进行考据作为历史研究的终点,而是要通过史料“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21]。总而言之,在探讨史料收集整理的同时,思考其运用问题对于中共高校党建史研究而言是一项现实意义很强的工作。当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拷问时,严肃的历史学受到了虚无主义的诘难。实际上,这种挑战从根本上是对史料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此,研究者必须作出回应。一方面,必须在历史书写中将史料转化成证据;另一方面,必须在研究中注重程序,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按照提出问题、查找史料、论证史料的顺序进行研究,切忌根据设想的问题对史料进行随意裁剪或削足

^① 在相关回忆录中,记载了解放战争时期一种被称为“迂回式”的党员发展方式,即通过地下党员观察、接触反感国民党统治的学生,有意引导他们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和进步学生运动,并根据其表现与言行判定其能够发展为党员后上报组织。经组织审核后,地下党员再去找那些发展对象谈话。常用的谈话方式是:“有某某人要介绍自己加入共产党,自己拿不定主意,因为你是我心朋友,来和你商量。”通常发展对象一听到这话会十分激动,表示积极赞成。而且有的还责问:“你不是老说要革命吗?还有什么犹豫的!”有的则是立即要求帮助自己也加入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下党员才说明实情,或说“咱们一块入党吧”,这样便完成了党员发展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368页。)

适履。换言之,史料是为研究历史问题而服务的,而不是隐喻现实的脚注与补充。

综上,鉴别与收集整理口碑史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研究者应该发挥独特的理解能力与想象力,从中寻找新的观点与视角,从而实现历史与史料的双向互动。对于中共高校党建口碑史料,革命时期学生运动史料集、青年运动史料汇编、知识分子和中共干部的回忆录与口述史料等都是其来源。如何从这些史料中获取中共高校党建史的相关历史知识、找出要研究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共高校党建史自主知识体系、触动对中共党史理论的思考将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参考文献:

- [1] 李守常. 史学要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1.
- [2] 杨军红. 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研究[D]. 湘潭:湘潭大学, 2015.
- [3] 彭定安. 彭定安文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327-329.
- [4] 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6-10.
- [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56.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413.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95.
- [8] 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M]//彭刚. 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43.
- [9] 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3:369.
- [10] 蒋光赤. 少年漂泊者[M]. 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6:122.
- [11] 江琼. 《少年漂泊者》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影响[N]. 文艺报, 2018-09-17(2).
- [12] 马克·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24.
- [13]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787.
- [14] 上海市档案馆. 五卅运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96.
- [15] 罗尔纲. 罗尔纲文集:第20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252.
- [16] 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袁广泉,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263.
- [17] 张注洪.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16.
- [18] 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4:107-108.
- [19] 王汎森.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116.
- [20] 周海燕. 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21(6):119-127.
- [21] 胡绳. 胡绳全书:第3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5056.

(责任编辑:李秀荣)